

# 农村社区灾后生计发展项目的社会工作介入 ——一个整合性脱贫行动的分析框架

杨发祥, 徐选国

(华东理工大学 社会学系, 上海 200237)

[摘要] 在汶川灾后的社会重建中,本土化的社工机构功不可没。受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国社会工作协会的资助,汶川县大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在该县映秀镇黄家院村开展了社区生计发展项目。结合项目实践,可以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和价值观等四大维度,建构整合性的脱贫行动理论分析框架,以探索农村社区灾后重建的社会工作介入模式,从而在实践上印证了整合性脱贫行动理论在灾后农村社区发展中具有较强解释力和适切性,这对于我国特大型灾后农村社区重建与生计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 农村社区;灾后生计发展项目;社会工作介入;整合性脱贫行动理论

[中图分类号] C 91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9162(2014)01-0128-07

国内外经验表明,社会工作介入在灾后社会重建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sup>[1]</sup>。“5.12”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海内外的非政府组织陆续介入灾害紧急救援、临时安置和灾后恢复重建。据不完全统计,介入汶川灾后果援助的 NGO 达数百家,通过实践介入和本土联结,最后扎根下来的有 30 余家。国际及港台的专业社会工作有丰富的灾害救援经验,大陆社会工作的灾害援助经验较为缺乏,社会工作介入灾害援助的实践模式尚处于探索阶段。汶川县大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以下简称“汶川大同”),就是为有效回应汶川特大地震后灾区恢复重建的需要,在灾区注册成立并扎根发展的一家本土性专业社工服务组织。本文基于“汶川大同”的社区生计发展项目实践,尝试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和价值观等四大维度,建构一种整合性的脱贫行动理论分析框架,以探索灾后农村社区重建和社区发展中的社会工作介入理论和实践模式。

## 一、脱贫行动的理论建构: 一个整合性的分析框架

### (一) 贫困的内涵及其根源

关于“贫困”的内涵,众说纷纭。在传统意义

上,“贫困”主要是指物质财富的匮乏,或缺乏奢侈品和生活必需品<sup>[2]</sup>。世界银行指出,“贫困”是指当某些人、某些家庭或某些群体没有足够的资源去获取他们在那个社会公认的、一般都能享受到的饮食、生活条件、舒适和参加某些活动的机会<sup>[3]</sup>(P115)。在官方的社会工作词典中,“贫困”被简单地定义为:处于贫穷或在金钱和生计手段上缺乏的状态。这些定义都忽视了不同个人、群体,不同文化、时期、观念和环境等因素对贫困的影响<sup>[4]</sup>。Karen 指出,贫困人群是指那些接受国家救济的人,或者在收入方面处于或低于贫困线以下,或者无家可归、没有任何正式收入的人群<sup>[5]</sup>。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能力贫困理论的提出,首次使用权利方法来看待贫困与饥荒的产生。该理论指出,应该用人所具有的能力来判断其生活处境<sup>[6]</sup>(P120)。由此观之,关于贫困的概念,已从单纯的经济领域,演化到文化、政治、社会等多重领域。在英语世界里,人们更为强调文化对处于贫困状态的人们的决定性影响,它主要指向于人的基本能力被剥夺,而不仅仅是收入的低下。正如世界银行所指出:贫困不仅仅指收入低微和人力发展不足,还包括人对外部冲击的脆弱性状态,以及缺少

[收稿日期] 2013-09-29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城市社区社会工作职业化与专业化研究”(02BSH041)

[第一作者简介] 杨发祥(1972—),男,安徽宿松人,社会学博士,华东理工大学教授,华理中国社会工作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从事应用社会学和社会工作研究

发言权、权利和被社会排斥在外<sup>[7]</sup> (P38)。台湾学者王笃强基于森的可行能力剥夺思想,提出从个体与环境相结合的角度来理解能力剥夺的观点<sup>[8]</sup> (P31)。这样,导致贫困的根源,已从单纯的个体归因向结构制度性因素和个人能力缺失转变,包括文化种族、政治权利、社会排斥等制度性因素,也包括受教育程度、健康程度等个体能力缺失因素,以及个人社会资源、机会等不能满足其发展需求,从而导致个人不能够获得全面自由发展的情形。<sup>[9]</sup>

## (二) 整合性脱贫行动的理论构建

建构一种整合性的脱贫行动理论,可以从海外脱贫行动实践的相关发展脉络<sup>[8]</sup> (PP. 54—55) 中获得思路启发和智慧支持,并从中汲取关于脱贫行动实践的有益元素。

第一,预设人的理性。认为在相关决策导引下,人都具有理性选择的能力,通过实现自由发展的目标来脱离贫困;

第二,揭示贫穷的根源,包括社会结构因素,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能力缺失,相信贫穷可以通过提升个人能力得以消除或减轻;

第三,预设共同的行动目标。通过特定的贫困度量度和相应的策略,重构贫困人口能力,以恢复其生产和生活能力,促进社区发展;

第四,体现一种特定的文化形态。海外脱贫行动政策及其实践是在其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下形成

的,一定要考察现实情境及特定文化等要素。

需要指出的是,海外脱贫行动实践主要以“工作福利”与“资产建立”为核心。所谓工作福利,是要摒弃福利等同于权利的观念,强调权利与义务的并重;所谓资产建立,是指要消除以所得为基础的福利,提倡和支持以财产为基础的福利,即建构“以资产为基础的福利政策”。然而,长期以来,我国尚未建立起以“工作福利”与“资产建立”为基础的福利体系,这些观点不适用于灾后农村社区建设与社区发展实践。

本文尝试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和价值观等四个方面,建构一种整合性的脱贫行动理论和分析框架<sup>[10]</sup>,并尝试用于阐释“汶川大同”在灾后农村社区生计发展中的相关实践,因而是一次本土化理论实践的努力。其中,本体论意指社会工作对穷人的人性假设,即人有追求全面自由发展目标的能力;认识论是指社会工作对贫穷根源的认识,即贫困是因个人能力缺失所致,而个人能力的缺失主要是由社会结构、制度性与个人自身等多重因素所致;方法论是指社会工作介入脱贫实践的行动目标与策略,即通过“资源为本”的视角、自我效能感的提升和社会资本的运用等策略,实现对穷人的增能;而价值观是指社会工作介入脱贫实践中应该秉持的文化敏感性,即立足于贫困人群的特征及其文化基础开展社会工作实践(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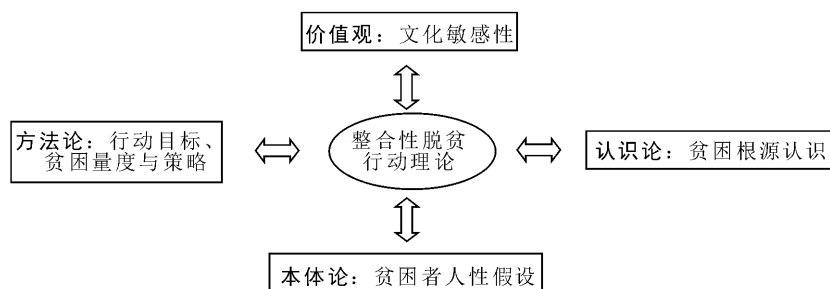


图1 整合性脱贫行动理论分析架构图

## 二、农村社区灾后生计发展的社会工作介入逻辑

“汶川大同”在开展农村社区生计发展项目的过程中,有效借鉴和运用了整合性脱贫行动理论的核心观点和社会工作的实践智慧,自觉运用专业理念和方法介入灾后重建实践,以提升村民社区自身发展能力和脱贫能力,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和价值观等方面形成了重要的经验与启示,探索出一种社会工作介入农村社区生计发展的脱贫行动实

践模式,有效解释了农村社区灾后生计发展的社会工作介入逻辑(见图2)。

### (一) 本体论: 积极人性假设和自由发展目标

灾民是受灾的主体,更是灾后重建方案的主要对象,能否融入受灾社区民众恢复计划的意向和需求,至为关键。社会工作介入农村社区发展时,要意识到村民是有智慧的。贫困人群具有丰富的知识潜能,他们自身拥有问题的解决方式。只有将他们视为积极的参与者,使其参与到社区发展过程中时,才能真正解决这些问题。社会工作者应不断向

居民学习，从而为政策、研究和社会工作实践提供重要支持<sup>[11]</sup>。对灾民进行积极的人性预设，相信居民和社区有能力自主自决<sup>[12]</sup>（P238），以及对于

灾区整体的优势视角，是“汶川大同”有效开展社区生计发展项目的根本前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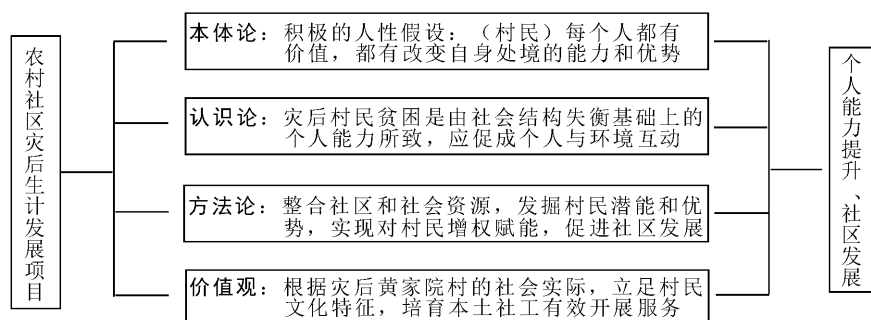


图2 整合性脱贫行动分析框架下的农村社区生计发展项目运作模式

基于地震对映秀镇黄家院村造成的巨大损失，“汶川大同”多次走村入户进行需求评估，发掘黄家院村村民面临的生计发展难题。同时，通过对黄家院村自然、地理等方面优势的分析，发掘社区自身具有的积极资源。“汶川大同”坚持将每个人视为积极主动的个体，他们都可以通过发掘其潜在优势、整合相关资源来改善不利处境，实现自我与社会的融合发展。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汶川大同”在争取到社区核心领袖的支持与带动的前提下，通过社区宣传与倡导，激发村民提高自我觉醒意识，加强社区参与和社区自决，通过村民自主和互助等方式，实现自我发展和社区发展。这种将每一个村民视为积极主动个体的人性假设，有利于村民认识和内化自身价值，发掘自身潜在资源和优势，促进自身能力的提升，也有利于村民积极主动参与社区决策和社区发展，不断加强互助合作，共同探索脱贫致富的目标。

（二）认识论：贫困的社会结构和能力缺失根源

米尔斯（Charles Wright Mills）提出个体困扰和公众议题相结合的议题，指出要将个人、家庭、团体和社区纳入特定社会历史脉络之中进行分析<sup>[13]</sup>（P9）。农村社区具有各自不同的特征，这些不同特征影响了人们如何面对问题，以及相关机构如何回应这些问题和需求。在农村社区加强政策计划和政策实施过程中，要注重农村社区生活中的政治脉络，积极关注正式结构、政策行动与制定，以及政策倡导、制定和实施等相关主体。

在积极人性预设的基础上，“汶川大同”进行了科学的贫困归因。在项目设计与实施过程中，项目组坚持认为，导致灾后黄家院村村民面临严峻生计发展考验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地震引发的社区社

会结构紊乱和失调所致。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社区原有结构发生解体，个人、社区的脆弱性凸显，削弱了灾后民众生存发展的能力和信心；二是黄家院村未被纳入灾后统建制度安排之中，具有明显的制度缺位，加剧了村民的生存保障风险和困难。因此，要有效协助村民探索生计发展的出路，就需要客观认识灾后村民面临的社会结构失衡现状，以及由此导致的灾民能力缺失状态。在灾后重建过程中，要改善村民处于贫困的不利处境，需要将村民个人与社区，以及整个灾后环境结合起来综合考量。只有促成个人与环境之间的有效互动，才可以提高黄家院村村民的参与意识和能力，加强村民能力建设，增强其社区归属感，因地制宜帮助该村发挥优势，提高村民收入水平，探索解决社区生计发展的难题。

（三）方法论：灾民能力建设与社区生计发展

在灾后重建过程中，社会工作服务实践必须通过理念化、项目化和方法论三大命题，才能有效对接灾后社区特质、回应灾民服务需求、嵌入灾区重建路径<sup>[14]</sup>。开展以社区为本、通用主义的创新性实践模式，游说政策制定者出台更多关于农村贫困和服务匮乏问题的政策，是回应农村社区发展需求的重要策略<sup>[15]</sup>。因而，社会工作者对当地情况的了解、运用多元技巧、坚持社区取向和集体主体取向，是农村社区发展的关键要素<sup>[16]</sup>。

那么，“汶川大同”是通过什么样的手段和策略，来实现引导映秀镇黄家院村村民参与社区生计发展，加强村民的能力建设，实现增能赋权、助人自助的目标的？结合项目实际，“汶川大同”的主要做法包括如下四个方面：第一，坚持“资源为本”的视角和方法，整合资源，提高村民社区参与和自决能力。资源及其运作在社会工作实务中作用

显著。有效整合资源，实现资源有效运作，成为开展灾后社区社会工作的重要手段。“汶川大同”在项目需求评估阶段，积极探索和发现黄家院村具有的自然和地理环境方面的资源，在与村民互动的过程中，确定了开展跑山鸡养殖产业的生计发展共识。通过链接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国社会工作协会等社会资源，为促进黄家院村村民开展社区生计发展项目提供必要的资金和技术支持。第二，提升村民自我效能感，发掘村民自身潜能，实现对村民的增权赋能。“反贫困”项目不应该以项目目标为导向，而应该以在村民中培育社区骨干和激发组织潜力为导向。以增权为取向，注重灾后重建中的社区能力建设，不断提高受助对象自我成长和自我发展的能力，是社会工作实践的重要工作路径。“汶川大同”通过专业社会工作方法，肯定每个人的价值和能动性，使村民在探索生计发展道路上具有强烈的信心和主动性，激发了村民不断挖掘和运用自身拥有的潜在优势，如个人关系网络资源、领导能力和组织能力等。第三，组建互助网络，提升村民能力建设，推进农村社区发展进程。社区重建中的社会工作实务，应建立一个以社区为平台、预防性与治疗性工作并重、以增加外部资源联结和内部资源发掘为根本宗旨的社区为本的综合服务框架。这样，实现社区组织化，尤其是社区邻里导向的组织化目标，如形成团体，引入社会公正理念，获得、维持和重构权力，创新可替代的制度，维持或恢复邻里关系等，是加强社区发展的重要路径<sup>[17]</sup>。“汶川大同”积极推动黄家院村相关村民成立跑山鸡养殖互助组，建立社区自组织，通过技能培训、团队能力建设等，不断提升村民自身能力，培育社区凝聚力，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社区生计发展进程。第四，重建社会资本，加强社区综合能力建设。重建社会关系是灾后重建的重要内容之一。在灾后重建实践中，要为居民和社区提供参与生活重建的机会，以激发社区复原力，建构灾区社会资本<sup>[12]</sup> (P246)。Mathbor 指出，与社区结合 (bonding within communities)、桥接社区 (bridging communities)，以及通过建立金融和公共制度体系与社区耦合 (linking communities)，是促进灾后社区社会资本重建的有效路径。只有在文化、社会和心理方面训练充足的社区，才能更有效地应对灾害<sup>[18]</sup>。“汶川大同”通过发动养殖互助组成员加强团队合作和凝聚力，培养社区领袖人物，通过各种正式渠道（如政府相关政策、互助组自身制度规

章）和非正式渠道（如邻里关系、社区关系、亲朋好友关系等），重建社区团结和信任关系，从整体上形成合力，推动了黄家院村整体重建能力的提升。

（四）价值观：注重灾民社会生活实际和文化特征

社会工作专业力量介入任何领域，都需要强调文化意识的重要性，实现一种在地化扎根和融入的过程，这是脱贫行动理论对社会工作实践的文化敏感性要求。社会工作者应该有意识地将农村文化脉络纳入其实践之中进行考量，并将资源匮乏造成的影响和需求，嵌入到社会工作者关于农村社区的概念理解之中<sup>[15]</sup>。社会工作要有效介入灾后重建，必须实施“专业性”社会工作，而“专业性”社会工作实务的关键在于，提升社会工作的专业能力与文化自觉。在灾后社区社会重建中，应坚持“本土导向”策略，即坚持外来经验本土化与本土经验专业化的整合。伴随着地震灾害演化进程，灾区民众逐渐形成了一种特有的“灾民文化”，并在一定时期内成为受灾群众生存与生活的主导文化。社区取向的社会工作者，成为当地社区居民的一分子，他们在开展工作时，积极融入本土社会、经济和文化脉络之中，有效地参与当地社区事务，推动了当地的社区发展<sup>[19]</sup>。“汶川大同”在推进社区生计发展项目过程中，通过扎根映秀镇的映秀社工来执行本项目，较好地把握了映秀地区民众的语言、文化等方面的独特优势；通过学习羌藏民族文化和生活习俗，经常参与到羌藏民族的文化活动之中，与当地民众进行了较好的融合；通过多次了解和考察黄家院村的实际情况，与该村民众达成了实施“跑山鸡养殖”项目的共识。这种坚持本土性、民族文化特点以及农村发展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有力地提升了项目开展的质量，促进了项目实施效果，这也是本项目得以科学有效开展的必要条件。

### 三、农村社区灾后重建与生计发展：

#### “汶川大同”的实践

汶川县映秀镇黄家院村处于震源附近，社会、经济等方面受到严重损害，是受灾最为严重的农村社区之一。加之黄家院村地处偏远，户居分散，交通不便，经济社会发展十分落后，且未被纳入到灾后政府统规统建中，村民需自己重建家园，民众面临着生计发展的严峻挑战。因此，探索灾后农村社区生计发展模式，成为社会工作介入灾后重建十分

紧迫的任务。“汶川大同”在黄家院村农村社区生计发展项目的社工介入实践，印证了整合性脱贫行动的理论解释力。

（一）社工介入准备：开展需求预估，达成生计发展项目共识

随着灾后重建的深入推进，以物质重建和精神家园建设为主的灾后重建项目，已经不能完全适应灾区民众的生存与发展需求。在中国扶贫基金会和中国社会工作协会的支持下，“汶川大同”映秀站社工数次到黄家院村调研考察，运用社会工作的专业方法开展需求评估，并多次组织召开村民议事会，与当地村民一起探讨黄家院村发展计划。结果发现，村民寻求致富、生计发展的需求特别强烈。在需求评估和村民议事的基础上，“汶川大同”协助村民初步达成了对黄家院村农村社区开展生计发展项目的思路和共识：一是结合黄家院村目前的环境优势，着重协助村民发展黄家院村农业生产，特别是发展具有经验优势的特色种植业和养殖业，既可以发展生计，又能推动产业的转型升级；二是在黄家院村灾后扶持政策不太完善的情况下，协助黄家院村链接更多的社会资源和政府资源，为黄家院村的社区生计发展提供直接的资金和物质支持；三是从村民要求改变现实处境的强烈愿望出发，通过开展各种专业服务，加强村民能力建设，特别是参与能力和互助能力，从而实现村民自身脱贫致富与黄家院村整体发展相结合的目标。

（二）项目运作策略：组建互助小组，提升村民互助合作能力

从国内外农村生计发展项目的成功经验来看，在整个农村社区面临贫困和生计发展需求的背景下，只有将农户组织起来，形成一个个互助团体，通过发挥团队协作的优势，才能促进整个社区生计的改善<sup>[19]</sup>。“汶川大同”在实施社区生计发展项目过程中，坚持社会工作在服务过程中的专业角色，通过社区宣传与倡导，鼓励村民自愿报名填写“跑山鸡养殖户申请表”，通过筛选，最后确定了20户符合条件的养殖户居民。在“汶川大同”相关顾问、督导的支持和协助下，入选农户成立了跑山鸡养殖互助组，并在共同协商下建立了黄家院村跑山鸡养殖互助组组织架构，通过民主投票方式选出互助组组长、会计/出纳员以及技术组、联络组和销售组等骨干成员（见图3）。通过成员共同商议和讨论，制定了一套详细的“黄家院村跑山鸡养殖互助组章程”，定时召开互助组成员大会，明确了相

关权利义务，在制度上保障了互助组的健康发展。与此同时，“汶川大同”对所有互助组成员开展了专业小组活动，旨在借助小组的集体力量，共同探讨关于养殖和互助组的发展思路，从而增强互助组的凝聚力和互助合作的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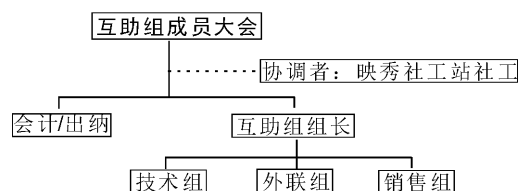


图3 黄家院村跑山鸡养殖互助组的组织架构

资料来源：汶川县大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网站，  
<http://www.wcdtsw.org>

（三）社工介入路径：鼓励村民参与，提升村民自觉发展能力

前期需求评估结果显示，村民不能较好地认清自身拥有的优势和资源，缺乏参与本社区发展与管理的意识，较少参与社区工作。“汶川大同”从社会工作的专业理念出发，认为“每一个人都是积极主动的个体，每一个人都拥有巨大的潜能，每个人都能通过整合相关资源促进自己发展，社区自身具有诸多资源”。他们积极调动当地村支书等核心社区精英的积极性，进行社区倡导，激发社区居民转变和提升自我认识，进一步培养民众的自觉意识和发展能力。项目社工通过积极理念的宣传，鼓励互助组成员不断提升社区参与意识。通过召开村民大会，对村民关于黄家院村拥有的有利资源和所处困境进行讨论，村民在自我认识、自我效能等方面得到了积极的提升和启发。在社区生计发展项目的实施过程中，项目社工与黄家院村跑山鸡养殖互助组成员之间建立了具有法律效力的协议关系，明确了双方的权利义务，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此外，通过对互助组成员进行系统、专业的团队能力建设和技能培训，以及提供实地经验交流和参观学习的机会，引导村民积极参与社区生计发展实践，加强村民的能力建设，从而实现增能赋权和助人自助的目标。

（四）介入成效评估：扩展服务效应，探寻社区生计可持续发展路径

推动灾区社会参与和社会和谐，是社会工作介入灾后社会管理与基层公共服务创新的重要举措。通过专业方法，助推灾后农村社区发展，是灾后重建的重要内容。“汶川大同”开展农村社区生计发展项目已有3年多时间，积累了开展灾后农村生计发展项目的一系列服务经验，是推动灾区社会发展的

重要力量。“汶川大同”尝试通过黄家院村跑山鸡养殖互助组实践,探索出许多关于农村社区生计发展项目的经验,并扩展和应用到更多的村民和农村地区,逐渐形成了一种社会工作介入农村社区生计发展的实践模式。黄家院村的经验应用和推广,产生了良好的示范效应。目前,“汶川大同”项目组在原有资源有效运作的基础上,不断整合其他社会资源,如争取当地县镇两级党委领导的重视和支持,争取汶川县畜牧兽医局等部门的养殖和预防经验支持,争取国际小母牛组织的专业督导力量支持,争取中国社会工作协会承担的中央财政支持项目资金支持和专业督导、培训、评估资源等支持。各种社会资源的有效链接,对于实现黄家院村农村社区生计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保障和推动作用。

#### 四、结语

社会工作介入灾后社会重建,本质上就是一种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建构式社会工作。在灾后社会重建进程中,嵌入、建构和增能,是社会工作服务需要张扬的三大核心概念和理念<sup>[20]</sup>。作为一种整合性的理论范式,脱贫行动理论包括对人性的预设、对贫困根源的认识、脱贫目标及策略,以及脱贫文化取向等方面的理论要素,需要结合特定人群

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脉络展开分析。

本文主要基于灾后社区重建这一特定的社会情境,结合汶川县黄家院村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历史等特征,开展了理论与实践的对话,对专业社会工作介入农村社区生计发展实践的理念、方法、路径和伦理考量等进行了尝试性阐释。本文坚持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相结合的方法论视角,既强调个人的积极优势及其在家庭、社区中的积极作用,也强调社区作为整体单位在致力于可持续发展过程中对个人和家庭的影响。然而,项目本身在运作过程中也存在的一些明显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脱贫行动理论对该实践的解释力。如在项目策划阶段,对贫困的度量,以及脱贫的相关指标考量不够;在项目成效评估中,如何评价互助组成员在多大程度上改善了贫困状况,社区在多大程度上获得了发展等方面的问题,未得到有效重视。互助组能否真正打通跑山鸡养殖的整个产业链,是该互助组能否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尽管如此,“汶川大同”开展的农村社区生计发展项目,是社会工作将整合性脱贫行动理论引入灾后农村脱贫行动实践的一次有益尝试,进一步丰富了中国社会工作的理论,为社会工作实践提供了一种新型的理论视角和分析框架。

#### 〔参考文献〕

- [1] Mohammad R. I., Kazem G. Social Work in Working with Survivors of Earthquake: A Social Work Intervention-Iran [J]. Social Work and Society, 2005, 3 (2).
- [2] Gove Narayana Reddy. Social work components in the integrated rural development programme in India [J]. International social work, 1986, 29 (1).
- [3] 世界银行. 1980 年世界发展报告 [R].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80.
- [4] David G., Ben-Zion C. Teaching about poverty in Israeli schools of social work [J]. International Social Work, 1992, 35 (1).
- [5] Karen L. An NGO's response to poverty and powerlessness on a British housing estate: Implications for social work education [J]. International Social Work, 1992, 35 (4).
- [6] [印度] 阿马蒂亚·森. 以自由看待发展 [M]. 任晓, 于真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 [7] 世界银行. 2000/2001 年世界发展报告: 与贫困作斗争 [M].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1.
- [8] 王笃强. 贫穷·文化与社会工作——脱贫行动的理论
- 与实务 [M]. 台北: 洪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2007.
- [9] 朱颖原. 农民发展的困境与解困之路 [J]. 山西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 (2).
- [10] 徐选国. 脱贫行动理论构建及其对我国社会工作实践的启示 [J].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 2012, (2).
- [11] Michal K. N. From noise to voice: How social work can benefit from the knowledge of people living in poverty [J]. International Social Work, 2008, 51 (4).
- [12] 曾华源. 灾害应变、重建资源运用与社区复原力之激发 [A]. 中华救助总会等编. 灾害救助与社会工作 [C]. 2010 年两岸社会福利学术论坛论文集, 2010.
- [13] [美] C·赖特·米尔斯. 社会学的想象力 [M]. 陈强, 张永强译. 北京: 三联书店, 2012.
- [14] 杨发祥, 何雪松. 灾后社会重建中的社工介入: 理念、目标与方法——基于四川省都江堰 Q 安置点的实证研究 [J]. 甘肃社会科学, 2010, (3).
- [15] Joan S., Joanne G., Kandie A. K., Joanna Z.

- Rural social work practic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Australia: A comparison [J]. *International Social Work*, 2004, 47 (4).
- [16] Colin T. . Rural social work in Scotland and eastern Canada: A comparison between the experiences of practitioners in remote communities [ J ]. *International Social Work*, 2006, 49 (5).
- [17] Loretta P. Community organizing for post-disaster social development Locating social work [ J ]. *International Social Work*, 2007, 50 (3).
- [18] Mathbor, G. M. Functionaries and Beneficiaries: Perceptions of Effective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in Bangladesh Coastal Development Projects [ J ]. *Social Development Issues*, 2004, 26 (2/3).
- [19] Emilia E. M. B. Community-oriented social work in a rural and remote Hebridean patch [ J ]. *International Social Work*, 1986, 29 (10).
- [20] 徐永祥. 建构式社会工作与灾后社会重建: 核心理念与服务模式——基于上海社工服务团赴川援助的实践经验分析 [J]. *华东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9, (1).

## The Intervention of Social Work in Rural Community Livelihood Development Project: An Integrated Framework of Getting Rid of Poverty Action

YANG Fa-xiang, XU Xuan-guo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anghai, 200237, PRC)

**[Abstract]** The local organizations of social work play an indispensable role in the process of post-disaster social reconstruction of Wenchuan earthquake. Datong Social Work Service Center at Wenchuan County, funded by China Foundation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China Association of Social Workers, has been conducting a rural community livelihood development project in Huang village of this county. From the practice of this project, this paper constructs an integrated framework of getting rid of poverty action, including ontology, epistemology, methodology and values, in order to explore an intervention model for social work in the process of post-disaster rural community reconstruction. Furthermore, the reality has confirmed the strong explanatory power and application of this framework, and proves its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values in response to the issues of community reconstruction and community livelihood development after suffering catastrophic natural disasters in China.

**[Key words]** rural community; post-disaster livelihood development project; social work intervention; getting rid of poverty action theory

(责任编辑 岳天明/校对 正圭)